

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抗议范式’验证¹⁾

——以《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为例

杨柳

摘要 西方学术界认为媒体在抗议运动报道上遵循边缘化“抗议范式”。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例,通过研究《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建构特点,验证“抗议范式”的适用性。研究发现,“抗议范式”大部分内容已不适用于《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在框架建构方面存在诸多“非边缘化”特点。本文证明了西方主流媒体抗议报道“抗议范式”的局限性,为探索西方主流媒体抗议报道及反战报道框架建构开辟了新路径。

关键词 美国主流报纸反伊战报道 框架理论 “两步走”分析法 反战报道范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外交学院讲师,北京 100037;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反战报道是抗议报道的一种。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在抗议报道研究领域得出了一贯性结论:美国主流媒体反战报道存在将反战运动边缘化的“抗议范式”,体现为新闻媒体在报道抗议组织及运动时倾向于关注抗议活动的外在特点而非他们所针对的议题,强调抗议组织及活动的暴力性而非其客观的社会评价,通过一系列报道技巧使抗议组织非法化、抗议活动边缘化,从而达到削弱抗议活动的效果、维护社会主流现状的目的。

这一研究结果不断被拿来指导后续研究,在提供启示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后续研究的思路。这种局限表现为:现有研究总是先入为主地将媒体报道策略设定在传统报道范式下,对报道进行“边缘化”框架分析,但框架分析结果却往往与研究者的预想不符。这种研究预期与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不禁让人反思初始研究视角的合理性。

随着冷战结束、反恐时代到来,国际局势和美

国国内政策导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力量,美国主流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参与和运作也必然经历了相应的调整。在此背景下,产生于冷战时期、越战背景下的媒体抗议报道“传统范式”在多大程度上仍适用于多极化反恐时代的今天?美国主流媒体真如人们所分析的那样在反战报道中只简单地一味跟从政府指挥棒,遵循几十年不变的“传统范式”吗?如此单一的结论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方利益交错的复杂社会里是否过于简单和武断?面对以上一系列疑问,本文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为切入点,对传统范式进行验证,以期获得一些启示。

二十一世纪反恐框架下最具影响和争议的国际性战争——伊拉克战争已被永远地记入历史,而这场历时九年的战争给当事国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仍然难以估量。针对美国主流媒体在战争中的表现,各方的批评指责声不断。有趣的是,就

1)基金项目:本文系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QY007)的最终成果。

在公众和学界依然如故地批评媒体跟从政府时,政府却抱怨媒体没有积极配合。媒体则叫苦连天,认为自己在官方的控制、公众的要求及自身运作规律之间苦苦挣扎。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契机。对于学界来说,仅凭表面感受批评媒体在伊战中的表现是武断且不负责任的。研究者有必要本着客观的态度,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结合当前时代和社会特点考察媒体反伊战报道,一方面验证传统范式的当下适用性,另一方面也期待获得新发现。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 1)《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建构有哪些特点?
- 2)“抗议范式”是否依然适用于《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
- 3)《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是否显示新范式?

一、美国主流媒体的“抗议范式”

抗议报道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西方学界抗议报道框架研究显示,媒体在报道挑战主流标准、价值观及信仰的组织时会强调其“偏离性”并质疑这些组织的“合法性”^[1]。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媒体对抗议组织进行“偏离性”与“非法性”报道时所使用的各种技巧和措施。

吉特林(Gitlin)分析了反越战运动媒体报道,指出媒体在反战运动早期对反战示威者进行“浅薄化”(trivialization)、“极端化”(polariz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报道,具体方法包括对反战者语言、衣着、行为及目的进行简化介绍;将反战运动视作“极端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将示威者描写成不正常或不具代表性的群体;通过缩小反战者人数进行蔑视性报道;弱化运动的影响;强调暴力行为;站在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的角度关注反战运动的对立立场等^[2]。麦克劳德和赫托格(McLeod & Hertog)揭示了记者如何通过引述公众意见来对激进抗议者的“偏离性”进行评价^[3]。

体现抗议者“偏离性”的另一明显策略是强调抗议的暴力性。默多克(Murdock)认为,抗议活动的暴力潜质是新闻价值的标准之一,他对英国反越战抗议进行分析,揭示了媒体在报道抗议时期待暴力发生的心态^[4]。科恩(Cohen)探讨了英国报

纸如何夸大上世纪60年代少数抗议集会者的暴力行为^[5]。麦克劳德(McLeod)指出,新闻媒体对抗议暴力性的强调经常会转移人们对抗议对象的关注,而将抗议者和警察对立起来。因此,很多新闻报道都采用了“抗议者 vs. 警方”的框架。这种转移对立方的做法值得关注,因为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是政治性的,而与警方对抗则是犯罪行为。另外,在“抗议者 vs. 警方”框架下,新闻报道的核心是抗议行为而非抗议议题。行为的内在娱乐价值和新闻客观性理念是媒体强调抗议事件本身而非议题的主要原因^[6]。

抗议者抗议对象的转移体还体现在信源采集上。警察局长和其他警方官员的评论经常被采写在新闻报道中,而原本的抗议对象——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的官员——却不被采访。一些最偏激的抗议报道甚至没有对抗议者的直接采访。就算那些引述抗议者的报道也不给他们足够的空间来充分表达他们对政策的批评。

在体现抗议活动“偏离性”方面,新闻报道经常试图区分“合法组织”和“非法组织”^[7]。休梅克(Shoemaker)发现,在记者眼中,抗议组织越激进,其合法性越低,其所得到的媒体报道也就越尖刻^[8]。记者们传递抗议“偏离性”的另一种做法是使用引号。抗议者的言辞和想法经常被加上引号,表明记者对其持怀疑态度^[9]。吉特林发现一些报纸通过将“和平游行”打上引号来质疑反战运动的和平性^[10]。

以上提到的“抗议者 vs. 警方”对抗框架只是抗议报道中经常采用的冲突及对抗框架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抗议者/反战者 vs. 政府,抗议者/反战者 vs. 军队,抗议者/反战者 vs. 支持战争者,抗议者/反战者 vs. 国家利益等对抗框架。这类框架及相关报道技巧被研究者称为“抗议范式”^[11]。

二、框架及框架分析理论

贝特森(Bateson)最早提出“框架”概念。他认为“框架”(frame)就是成组或成群的讯息或有意义的行动,受者可凭借有意义的指代来识别框架。后来,美国社会学家E.戈夫曼(Goffman)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再后来,随着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

向,框架理论又被引入大众传播学领域,从80年代起开始受到国外传播学界的重视^[12]。

框架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新闻框架分析方面。新闻框架(分析)理论旨在描述媒体选择并强调现实某些部分的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框架定义由恩特曼提出,即“构建框架就是选择所感知事实的一些部分,使它们在一个传播性的文本中凸显出来,以便促进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及对所描述问题的处理建议等。”^[13]

记者在撰写新闻文稿时为“凸显”报道对象所采用的一系列框架建构方法可被视为框架建构元素。这些元素也是研究者在进行框架分析时的测量单位和分析对象。到目前为止,框架分析领域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并统一践行的框架分析体系。人们大多只凭借个人主观理解对框架进行界定和分析。当然,这与框架建构元素本身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有很大关系。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开放性研究方式所具有的优势是不限制研究者在发现新框架方面的创造力。但仅依赖创造力可能会带来研究的任意性以及框架界定过程中的不透明^[14]。因此,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形成一套可靠的框架内容分析指标来分析新闻框架建构情况。

马蒂斯和柯灵(Matthes & Kohring)^[15]曾在研究中提出了框架元素分析的一整套方案。他们以上述恩特曼的框架定义作为理论基础,将定义中所提到的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问题处理作为四个框架元素,每个框架元素又包括若干内容分析变量,即框架元素的不同表现形式。再通过“聚类分析”将这些框架元素/变量的聚类模式统计出来,这种模式即被视作框架。两位研究者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这一方法不仅应用于恩特曼的框架定义,还应用于任何一种有关框架元素的操作性定义。本文将延续马蒂斯和柯灵的研究思路,通过框架元素来识别框架类型。但在框架构成元素的判断方面,笔者与两位前辈的观点有所不同。两位前辈直接将恩特曼框架定义中的四个方面——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问题处理作为框架的构成元素。而笔者认为,这四个方面与其说是框架构成元素不如说是框架所能实现的“特定功能”^[16]。每个新闻文本的主题

和重心各有不同,其框架功能必然也各有侧重。因此,这四种功能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于所有新闻文本中,尤其是以反战运动为对象的新闻报道,其框架功能想必更多侧重于对反战组织、反战运动及运动参与者的形象塑造和对其合法性的评判。新闻框架的构成元素应在样本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普遍存在的框架元素为测量单位最终得出的框架结论才最具说服力。于是笔者决定对框架元素进行重新界定。

框架研究者认为,分析框架构成要依靠“可识别的概念和语言特点”,可识别、可概念化和具象化是判别框架建构元素的重要标准^[17]。

综合梳理以往研究结果,加以必要删减和补充,本文确定以下六大框架分析要素:1)特定叙述语境;2)主题;3)事件;4)新闻报道要素;5)修辞技巧;6)文章语气基调。

为使框架元素测量更具操作性,在某些框架构建元素下又设若干具体考察变量(表1)。

表1:框架元素的考察变量构成表

框架元素	变量
1. 新闻报道要素	时间,是否新闻社统一供稿,标题,字数,新闻类型,导语,引语(信源:权力方,非权力方;目击者口述),民意测验,其他第三方统计数据,第三方专家意见,图片
2. 叙述语境	语境
3. 主题	主题,次主题
4. 事件	各方行动关系
5. 修辞层面反战形象建构	反战运动描述,反战者描述,反战运动(者)消极描写,反战运动(者)积极描写,形象塑造其他相关变量(暴力冲突描写,非暴力对抗描写,反战者被捕,与警方关系),反战诉求/观点陈述,反战运动结果,反战者之前参加过的抗议活动,人情味描写,主题挖掘,与过去事件相比较(互文性),挺战描写,其他关键词,标签的使用,比喻及其他修辞
6. 语气基调	语气基调

三、研究对象及样本搜集

本文以《纽约时报》反伊战争运动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反伊战运动是指在美国国内举行的、由

美国民众组织并主要参加的针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而举行的抗议活动。本研究涉及文体包括新闻、社论与专栏。研究时段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即战前阶段从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大公布战争计划引发第一次反战抗议开始到2003年3月19日战争打响。第二阶段即战中阶段从2003年3月20日到2003年12月14日美军抓获萨达姆。虽然布什总统早在美国东部时间2003年5月1日晚就在从海湾返航的“林肯”号航母上发表讲话,称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并将“任务完成”的横幅挂在航母上。然而时至布什任期结束,美军既未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能根本改变伊拉克混乱动荡的局面。种种挫败使得布什总统于2009年1月12日在任期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2003年宣布伊拉克战争“任务完成”是个错误。因此,相比“建立伊拉克民主政府”、“铲除恐怖主义分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其他战争目的,“抓获萨达姆”似乎是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最早也是最切实的“战果”,对推动伊拉克民主进程,安抚美国国内民众怀疑情绪,促成布什成功连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最重要的是,抓获萨达姆成为美国民意和媒体报道态度的又一个转折点,对本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其设定为战中阶段的结束点。第三阶段即战后阶段从2003年12月15日到2009年12月31日样本搜集日。本文从LexisNexis Academic上共获得符合条件文本166篇,经初步通读筛选,最终获得文本113篇。

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打破了过去反战报道框架分析中单一而局限的分析模式,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手动分析与软件分析相结合,从框架元素确认及测量到框架识别“两步走”的综合框架分析法对研究文本进行框架分析。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目的有二,一是探究《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特点,二是对反战报道“边缘化”范式进行验证。首先,本文从以下四个维度对报道进行框架分析:功能框架、风格框架、态度框

架和内容框架。功能框架分为深度报道和表面报道,识别依据为框架元素中的“主题挖掘”一项。风格框架分为人情味报道和非人情味报道,识别依据为“人情味描写”变量。态度框架分为三类:积极、消极和中立,依据态度相关变量的态度值总和来判定。内容框架具体分类视框架分析中的“主题”变量并结合其他相关变量的内容综合而定。具体研究步骤为:首先依据框架元素表对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对每项框架变量赋值;然后对四种框架维度相关变量赋值分别统计,必要时计算两变量之间的关联性。

其次,关于“抗议范式”验证,下表依据以往学者对该范式“边缘化”技巧的具体描述列出对其进行验证所需考察的相关变量(表2)。

接下来针对各项“边缘化”技巧对相关变量进行定量分析(统计内容,数量,比例及相关性分析等),得出验证结果。

五、结论

本论文在开篇就提出了本研究旨在回答的三个研究问题,下面就对这三个问题予以逐一回答,做为本文的结语。

(一)《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特点

1.从功能框架上来看,浅层报道比例高于深度报道,但深度报道也占相当比例。

2.从风格框架上来看,人情味报道低于非人情味报道,比例约为1:4。

3.从态度框架上来看,积极框架比重明显高于消极和中立框架,三者比约为6:1:1.5。

4.从内容框架上来看,本研究发现了11种内容框架类型。按出现频率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反战运动白描、反战者权益框架、对抗框架、控制框架、反战组织发展框架、反战人物特写框架、合作框架、反战组织削弱框架、无效反战框架、有效反战框架和政治斗争框架。

5.从不同功能框架的态度倾向上来看,深度报道与浅层报道相比,态度类型更容易为积极和中立,态度类型为消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6.从不同风格框架的态度倾向上来看,人情味报道较非人情味报道更容易体现积极态度。

7.在11种内容框架中,“对抗框架”倾向为消

极态度;“反战人物特写”倾向于积极态度;“反战运动白描”倾向于积极态度;“反战者权益”倾向于中立态度;“反战组织发展”倾向于积极态度;“反战组织削弱”倾向于中立态度;“合作框架”倾向于积极态度;“控制框架”倾向于消极和中立态度;“无效反战框架”倾向于消极态度;“有效反战框架”倾向于积极态度;“政治斗争框架”倾向于消极态度。

(二)边缘化“抗议范式”验证

通过对“抗议范式”的逐项验证,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9项边缘化策略中,5项成立(2,5,13,14,18),9项不成立(1,3,4,6,7,8,9,16,19),3项成立但比例较低(10,11,12),2项不完全成立(15,17)。其中,不完全成立的情况是指虽然某项“边缘化”策略在文本中的确存在,但是文本中更多存在的是与其相反的“非边缘化”策略的使用。鉴于上述分析,边缘化传统范式中只有小部分依然适

表2:对“边缘化”技巧进行验证的变量表

序号	“边缘化”技巧	相关变量
1	反战运动所取得成绩被忽略	有效抗议框架 vs. 无效抗议框架; 发展框架 vs. 削弱框架; 反战运动结果+发展描写
2	在“抗议者 vs. 警方”的框架下,新闻报道的核心是抗议行为而非抗议议题	内容框架: 对抗框架(抗议者 vs. 警方); 功能框架: 表面报道 vs. 深度挖掘
3	报道更加依赖官方信源,包括警方信源; 不注重普通民众和反战者的采访	权力方信源 vs. 非权利方信源
4	一些最偏激的抗议报道甚至没有对抗议者的直接采访。就算那些引述抗议者的报道也不给他们足够的空间来充分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批评	反战观点表述
5	警察局长和其他警方官员的评论经常被采写在新闻报道中,而抗议者原本的抗议对象——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的官员——却不被采访	对象权力方信源; 其他权力方信源
6	通过对旁观者的采访,体现其对抗议行为的不屑和反对态度	目击者口述
7	引述民意来突显主流公众和抗议者之间的鸿沟	民意调查态度
8	引用对反战者不利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9	将反战者置于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方,对抗框架包括: 抗议者/反战者 vs. 政府, 抗议者/反战者 vs. 军队, 抗议者/反战者 vs. 支持战争者, 抗议者/反战者 vs. 国家利益等	对抗框架; 各相关方关系
10	怪异表演, 儿童游乐室景象/白痴形象	反战者小丑形象
11	狂欢聚会	反战运动闹剧形象
12	概括性描写(对反战运动人数、规模、影响等削弱式概括)	削弱描写
13	一般性非法化(暴力、阻碍交通、踩踏等)	干扰社会秩序; 暴力
14	抗议即叛国、抗议即无政府行为、抗议即反军队	对抗议的消极命名
15	“抗议者 vs. 警方”框架的使用, 因为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是政治性的, 而与警方对抗则是犯罪行为, 转移对抗对象导致新闻媒体经常将激进抗议者等同于罪犯来描述与警方对立; “抗议者 vs. 警方”的框架中, 抗议者被描写成挑起事端的人, 而警方只是适当应对以恢复秩序。	抗议者 vs. 警方对抗框架; 抗议者 vs. 警方对抗关系
16	抗议者的言辞和想法经常被加上引号, 体现了记者对其怀疑及不认可的态度。将“和平游行”打上引号来质疑反战运动的和平性。	修辞部分引号的使用
17	与历史类似人物及事件相比较	与过去事件相比较(互文性)
18	挺战者描写	挺战者描写
19	消极报道策略的使用多于积极报道策略	积极报道策略; 消极报道策略

用于本研究文本,大部分都已不适用。另外,还有小部分边缘化策略适用程度十分有限。因此,虽不能完全将“边缘化”传统范式中的所有内容都予以否定,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该范式已不再能充分体现《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的框架特点。

(三)《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建构新特点

在《纽约时报》反伊战报道框架分析中,本研究还发现了一系列积极报道策略,或称“非边缘化”报道策略:1,直接积极描写,对反战者和反战运动的赞许性报道;2,反战和平描写,强调反战抗议的和平性;3,发展描写,强调反战运动、组织及个人在规模、组织和思想各方面的发展;4,对反战者、反战运动及反战组织的积极命名。

上述积极描写是先前相关研究所不曾关注和提及的,更是与反战报道“传统范式”所代表的态度和导向截然相反。这些积极描写一方面说明反战运动(至少是反伊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媒体的认可和肯定,体现了反战运动在媒体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主流媒体(至少是《纽约时报》)在报道反战运动问题上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言,只有边缘化、非法化及削弱化处理,而是展示了反战运动的双面性,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对平衡报道的追求,表达了媒体自身的声音。因此,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可知,笼统地断言美国主流媒体在反伊战报道上依然遵从边缘化“抗议范式”,一味跟从政府的指挥棒,传达军方及政府对反战运动的边缘化态度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论断。

本研究因样本规模及来源有限,所获发现并不足以成为彻底推翻反战报道“边缘化”传统范式的依据。但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首次提出了“边缘化”“抗议范式”的局限性并发现了诸多“非边缘化”反伊战报道措施,从而打破了“抗议范式”普遍适用性神话,将美国主流媒体反战报道框架研究引向了多元化范式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D. M. McLeod: “Communicating deviance: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social protes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XXXIX, (1995), pp.4—19

[2]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27-28

[3] D. M. McLeod & J. K. Hertog., “The manufacture of ‘public opinion’ by reporters: Informal cues for public perceptions of protest groups,” *Discourse and Society*, III, (March, 1992), pp.259 - 275

[4]G.Murdock, “Political deviance: The press presentation of a militant mass demonstration,”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eds. S. Cohen & J. You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1), pp. 206 - 225

[5] Stanley 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bs and rocke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2), pp. 20-21

[6]Todd Gitlin. “Spotlights and shadows: Television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ollege English*, XXXVIII, (1977), p. 798

[7] G. Murdock, pp. 206 - 225

[8] Todd Gitlin, *Spotlights and shadows: Television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p795

[9]PJ Shoemaker, “Media treatment of deviant political groups.” *Journalism Quarterly*, LXI, (1984), pp. 66 - 75, 82

[10] G.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pp 95-97

[11]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p.28.

[12]J.M.Chan, & C. Lee, “Journalistic paradigms of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ds . A. Arno & W. Dissanayak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p. 183-201

[13]何静:《从我国报纸国际新闻标题设计看新闻文本的框架建构》,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4页

[14] R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XLIII, (1993), pp.51-58

[15] Thomas Koenig, “Compounding Mixed-Methods Problems in Frame Analysi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VI, (2006), pp.61-76

[16] Jörg Matthes & Matthias Kohr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Media Frames: Toward Improv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LVIII, (2008), pp. 258-279

[17] Lauren R.Tucker, “The framing of Calvin Klein. A frame analysis of media discourse about the August 1995 Calvin Klein Jeans advertising controvers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XV, (1998), pp.141 - 157

[18] C.H De Vreese, J. Peter and H.A. Semetko,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XVIII, (2001), pp.107 - 22